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四四期 ——  
(二〇〇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306c)

---

【史海钩沉】“汉奸”陈永贵是如何过关的？	范银怀
【岁月风声】王洪文胞弟王洪武谈家事	峻 宏
【人间沧桑】孙玉国：昨天和今天	小 斌
【认识世界】“文化大革命”前期人们眼中的中国和世界	翁有为
【了解中国】我见到了周恩来、张春桥和王洪文	郭 莹
【史实辨析】关于 1975 年整顿的若干史实和一个提法	程中原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mailto: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史海钩沉】

“汉奸”陈永贵是如何过关的？

• 范银怀 •

### ◇ 老贫农赵怀礼讲大寨村史

1964 年春夏间，毛泽东虽然还未正式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但在党内领导层已经听到毛泽东“农业要靠大寨精神”的讲话，因此新华社总社国内部农村组和山西分社领导，就派我到大寨蹲点采访。

来大寨不久，就和一位名叫赵怀礼的贫农相识。他是陈永贵儿媳花妮的伯父。当时大寨还没有招待所，外来客人都挤在几间平房里，为找个安静地方写稿，我就住到他家里。

赵怀礼对来人谈话也无顾忌。平时，他不下地劳动，也不参加队里活动，也不会迎合干部。闲下就躺在铺着毛毡的炕头上聊起天来。我是从他口中才知道 1945 年昔阳刚解放的历史。

听了赵怀礼对大寨和陈永贵历史的讲述，联想到陈在《党员登记表》填的参加过“兴亚会”，知道他的经历很不一般。没想到后来他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竟由此引发出一连串政治事件。

#### ◇ 刘格平把张怀英证明信转给“中央文革”

1968年10月，“文化大革命”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在阳泉市副食品公司炊事员李观海（大寨公社武家坪人）的档案中，发现李在1955年镇压反革命时交代他曾参加了昔阳县日伪特务组织“兴亚反共救国会”，并担任情报员。该情报组中还有阳泉市粮食局管理员王久荣（大寨公社金石坡人），王写的材料，也承认自己参加过日伪组织“兴亚会”，内中还有“领导人是陈永贵”的字样。

当时六十九军在阳泉市的支左部队负责人将此情况向党委作了汇报，军党委派人审查了同案人的口供，查阅了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一二九师锄奸部的一份昔阳县敌伪情报人员名册及敌伪档案，其中就有陈永贵的名字，并注明是伪村长，情报员身份。日本关押时的审讯材料，上面写的是“归顺释放”。陈还是“兴亚会昔阳分会领导成员之一”，每周两次去昔阳城给敌宪兵队送情报，直接与日寇宪兵队长清水联系。支左部队负责人说，当时群众称他是“陈二鬼子”。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照他自己的说法是“与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凡是在国民党、日本统治时期被捕过的都是重点审查对象，而且一开始都是当敌我矛盾，交给造反派审查、批斗，从刘少奇到基层的当权派，都逃不过此关。

这是关系陈永贵政治命运的问题，与他一起“造反”掌了权的“战友”都捏着一把汗，因为他们的政治命运和陈永贵联系在一起。

“文革”初期，和陈永贵同时进到省核心小组、并担任办公室主任的张怀英对陈永贵说，你的历史问题我清楚，我在一区工作5年，县里工作10年，对当地的社会情况比较了解，我写份材料，让刘格平（当时的山西省革委主任）转给中央文革。1966年7月，张怀英在大寨对我说：1948年6月考察陈永贵入党问题时，就调查过他的历史问题。当时规定，吸收党员要有两人介绍，区委书记签字。我当时是大寨所在区的区委书记，对待这个问题特别慎重。大寨所在的一区是在县城周围，被迫参加伪组织的较多，一区肃反时，凡是“兴亚会”、“自卫团”的一律不登记，不填表，一笔勾销，使这些人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当时的区长张立栋说，陈永贵的伪代表问题搞不清，而我对陈永贵搞“老少组”印象好，于是亲自调查，知道“兴亚会”原来是特务组织，后来成了群众组织。

张怀英按这个口径向中央文革写了材料，刘格平又把向上反映的情况告诉了陈永贵，陈永贵心情平静了些。

#### ◇ 我地下工作者谈“兴亚会”社会背景

昔阳县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38年，刘伯承、邓小平率领八路军一二九师到这里，一边和日军打仗，一边宣传，播下了革命种籽，在皋落等远离县城的边远山区建立起抗日根据地。

日军占领昔阳县，经常到乡村扫荡，所到之处，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当时的秦基伟、赖际发支队参谋，和打入当时日伪宪兵队的我地下工作者、昔阳籍老干部刘增玉他们都向我讲过，在昔阳县城只有100多个日本兵，凭借着有洋枪洋炮和“武士道”精神，闹得10多万人民鸡犬不宁，老百姓深恶痛绝的“棒棒队”就是一伙无恶不作的汉奸走狗。日

本人又通过“新民会”这些外围群众团体控制“良民”。日本的大本营叫红部，译成中文叫本部，汉奸特务的大本营叫“宪兵队”，其情报组织就是“兴亚会”。这里的监狱叫留置场，为首的日本兵叫清水，是个上士，他控制着“兴亚会”情报网，伪代表搜集的情报都送到他这里。抓来的八路军和有“八路”嫌疑的无辜百姓都在宪兵队审讯、处刑，一般都是“活着进来，死着出去”。打人、杀人，也很费力气，为了省劲，索性在西河滩挖出一丈多深的大坑，将人活活埋掉。

这个仅有十多万人口的小县，日军占领期间竟有5000余名青壮年被残杀，2.9万余头牲畜被掠杀，2100万斤粮食被抢走或烧毁。

#### ◇ 陈永贵大难不死

1940年，日本侵略军推行“三光”政策，大寨有27名青壮年被活埋葬身。在兵荒马乱、饥寒交迫中，先后有35人死于非命。

陈永贵6岁随父到大寨，房无一间，地无一垅。不久，父亲因贫困潦倒，卖妻抛子，走投无路，上吊身亡。无依无靠的陈永贵就寄居在一寡妇家，为地主放牛，扛长工。他本是穷光蛋，又是从外村来的，社会地位更为低下，而他又不安分守己，因而受过种种屈辱。他为改变地位，奋力抗争。

陈永贵胆子大，又能说善辩，受到当时村长、地主贾泰元的赏识。1942年当了维持会代表，那年陈永贵27岁，他给日本办事，还与八路军干部保持着联系，说明他很会周旋。不料，因一次送粮出了问题，宪兵队以通匪罪将他逮捕，关入留置场。

怎样出狱的？陈永贵自己说是八路军干部把他营救出来的，还有材料说是他妻子李虎妮托人保出来的，从敌伪档案中查出是“归顺释放”，后以“兴亚会负责人”身份继续向“宪兵队”大队长清水送情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一周后，昔阳县城从日军溃退中解放。而盘踞在五六十华里外的平定、阳泉的阎锡山部队随时准备占领昔阳。阎方要攻，我方要守，昔阳县城经常处于“坚壁清野”的战备状态。军民警惕性特高，只要从阳泉、平定来的都怀疑为间谍；往阳泉、平定去的被怀疑是逃亡汉奸、地主。

为保卫解放区，昔阳县领导根据《太行区1946年工作方针》批示，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反奸反霸，诉苦清算运动。接着就搞土地改革。

陈永贵是大寨贫雇农中的一员，却列为“反奸”对象而被批斗。

1946年7月1日，中共建党纪念的那天，昔阳县委举行了盛大的集会，会场就设在“万人坑”的西河滩。县委领导宣布开会后，有一项议程就是处决一名汉奸。将这个汉奸吊到树上，脱去衣服，赤条条的，民兵又用刺刀从汉奸的大腿上割一块肉，塞到他嘴里。以这种方式纪念党的生日，足见对汉奸仇恨之深。在这种政治气候下，曾被群众称为“二鬼子”、当作汉奸嫌疑斗争的陈永贵，引起群众的激愤是可想而知的。

在日寇刺刀尖逃生、解放后又在反奸除特斗争中险些丧命的陈永贵，经过了各种痛苦和磨难，真可说是大难不死。据说当时主持斗争会的还是当初怂恿、支持他当伪代表的贾泰元。陈永贵认为受了这些有权有势人的愚弄，激发起他对这些人无比愤恨和从斗争中求生存的决心。

#### ◇ 土改中，陈永贵挺起了腰

1946年至1947年昔阳的土改是在“急风骤雨”中进行。离县城十几里的大寨也在清算自己血泪史。大寨村只有64户，193口人。按当时划分的阶级成份：贫下中农44户、富裕中农16户，地主富农4户。全村土地700多亩，40多户贫下中农只有144亩劣等山地，就是说，60%的耕地归地主富农所有。领导大寨土改的贾进财、贾承福，他们按照党的政策，通过民主讨论，把土地、浮财分给了贫下中农。

陈永贵以一个“赤贫”的“无产者”身份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和贫雇农一样分得了土地、房屋和浮财。政治上抬起了头，他响应党的各项号召，主动报名参加民工支援前线。新旧社会对比，激发起他对地主富农的仇恨，对穷哥儿们的同情。他说：“现在翻了身，就要革命。”“宁死在马前，不死在马后”。他认为地主、富农本性难移，“狼就是狼，变不成羊”。他的极“左”情绪开始暴露。一户富裕中农是军属，也分到一份浮财，他质问贾进财：“土改是给穷人的，为什么分给富裕中农？”贾进财只好收回这份浮财。

#### ◇ “我要向毛主席请罪！”

虽然陈永贵成了高举“三面红旗”的旗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锋，但他对历史问题心里很虚，到关键时刻就慌了神。

党的“九大”召开前，中央责成山西“支左”部队党委审查出席“九大”的山西代表，谢振华当时是第六十九军军长，后为省委第一书记，是审查小组负责人。陈永贵是“九大”代表，他知道此决定后，主动找谢振华交待他这段历史问题。

《谢振华回忆文集》写道：“当时我约他在迎泽宾馆六层中间靠左边的一个房间里和他谈话。他一坐下，痛哭流涕地说：‘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请罪’。我说：‘不要着急，有什么问题可以详细谈出来。’他说，‘我在抗日战争的1942年，被日寇抓去后，被迫自首了，后来还被迫参加了日伪情报组织‘兴亚会’，给日寇送了情报。我是三人小组的负责人。’我又问他，送情报和什么人联系？陈回答：‘是和日本驻昔阳宪兵队的清水大队长直接联系，规定每周去送两次情报。’”

《谢振华回忆文集》又写了向上反映的经过和自己的看法：“陈永贵的历史问题被发现以后，于1968年9月，我即派当时出席‘军工会议’的李金时（六十九军副军长）将陈永贵的问题呈报周总理。周总理当即指示：‘六十九军的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影印件可报中央。’

“遵照周总理指示，1968年12月，以六十九军党委名义正式上报北京军区党委转呈中央。

“周总理陪外宾参观大寨时，我又当面向他作了请示。总理说：‘要维护大寨红旗，作为历史问题，仍可让陈永贵当代表出席九大，但只当代表’。”

#### ◇ 批极“左”和“黑材料事件”

六十九军按组织程序把陈永贵的历史问题材料呈报北京军区党委，军区党委上报到党中央、毛泽东。这个问题没有影响到陈永贵1969年在“九大”当上中央委员，也没有妨碍陈永贵1973年在“十大”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出人意料的是，批林批孔中，“四人帮”整谢振华时冒出一个“整陈永贵黑材料”事件。

批林批孔，实际是借题发挥。一天，江青穿着军装到山西赴京的《三上桃峰》剧演出处，“炮轰”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司令员谢振华。说这个剧是为刘少奇翻案的（此剧与刘少奇毫无关系，谢与此剧也无关系）。

1972年8月2日，周恩来总理在一次外贸、外事和宣传会议上指出：“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极“左”思潮就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端”。他强调，“运动与业务不能对立”，政治挂帅，“就是要挂在业务上”。

山西省根据周恩来讲会议精神，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同时对各个行业进行整顿。工厂反对停工，保证正常生产，农村则抵制学大寨运动中搞“穷过渡”、取消自留地，实行“政治工分”等一系列“左”的作法。

山西省委批极“左”时，陈永贵却在昔阳县“反右倾”。1972年10月前后的两个月里，昔阳县连续召开县社干部会议。陈永贵在会上说，批极“左”给我们出了个难题。他要求全县干部充份认识“文革”的目的，要充份思考“每当斗争激烈的时候，毛主席要求我们干什么”他针对一些干部怕抽调专业队上大工程会违反政策的顾虑，大批“保守”、“右倾”，以增加专业队人数，组织大兵团搞“大会战”。

王洪文、纪登奎、倪志福、陈永贵接见山西代表时，陈永贵说：“到现在还搞我的历史背景。”王洪文说：“搞中央政治局同志的材料不是小事，不是一般问题……谁搞的，关起来。”在这种高压下，如实向上反映陈永贵“历史问题”的干部招来横祸。

1974年5月，陈永贵到昔阳县白洋峪公社等地抓典型，向干部们说“批林批孔是全国性的，我们拿不出经验是不行的”。“什么复辟，倒退，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都要给予迎头痛击”。

不批极“左”批右倾，陈永贵成了“正确路线的代表”，符合了毛泽东意图，受到“四人帮”的赞赏。接着，“四人帮”又批谢振华、曹中南（省委第二书记）“抵制和干扰农业学大寨运动”。

江青说：“大寨在山西，你们应当感到是很光荣的事”；“学大寨要学它抓阶级斗争，坚持社会主义，不复辟，不倒退。”

王洪文说：“你不学大寨的路线，学什么？”当场责令谢、曹回山西接受造反派批斗。

当时的中央要陈永贵主持批斗大会，集中批谢、曹“错误”，还要他们交代整陈永贵“黑材料”问题。

◇ “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

因谢振华在担任六十九军军长期间通过北京军区党委向中央报告过陈永贵的历史问题，北京军区党委又把驻山西的六十九军领导集中到军区，要他们同“谢振华划清界线”，对反映陈永贵历史问题作出交代。新调来的六十九军政委戴秉孚是个正派老实人，他认定向中央如实反映问题是军党委的职责，没有错。

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讨论时，也发生了争议。有人说，这是按组织程序层层上报的材料，不能说是黑材料，于是修改稿把“黑”字抹掉，只说是“整大寨材料”。又有人提出异议：在自

己职责范围内，通过部队党委向上反映问题，为什么当错误检查？

正在争执不下，传来了毛泽东的声音。

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是“文革”中能直接听到毛泽东指示的军政要员，他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但也不说反映问题的六十九军和北京军区党委有过错，他向六十九军领导传达毛泽东声音：

“陈永贵历史问题，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

“主席知道了”，这在当时如同传下了“圣旨”，谁都不吭气了。

毛泽东在1964年知道了这位42岁才扫盲的陈永贵会讲“逻辑”，过71岁生日时特地请他吃饭，称他是“庄稼专家”，对这位“文革”中“步步紧跟”、坚持集体化道路的英雄人物关爱有加，把他领导的大寨当作农业发展的方向，一个理想的模式，中国农业过关，就靠举这面旗帜。据说，毛泽东认为陈是受压迫的穷苦人，所以对陈永贵的历史问题不予追究，保护过关。

陈锡联抗战早期是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旅长，是有名的战将。他代表中央作解释工作，说他抗战初期就在昔阳这一带打仗，那时玉米长得只有膝盖那么高；现在长得一人多高，语重心长地说：“农业还得靠大寨！”

陈永贵又是一次有惊无险！不仅未追究历史问题，反而平步青云。继1969年“九大”当上中央委员、1973年“十大”当上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上陈永贵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是当作绝对保密只在少数有关的高级军政领导中传达，因此议论只在这个范围内平息下来，而参与过陈永贵历史问题调查和争论的人不知道毛泽东对陈永贵历史问题的态度，只看到他地位越来越高，声望越来越大，还以为陈永贵真的是被别有用心的人无端攻击，因此，对调查陈永贵历史的人都还当作“整中央领导黑材料”，更理直气壮地“保卫中央领导”。直到1977年初，揭批“四人帮”中，阳泉市还有人提出“整陈永贵黑材料”事件，有关人员被列为清查重点。山西日报驻阳泉记者写的《内参》中说，对王敏等29人非法审查，住进“土监狱”的6人，进清查学习班的17人，勒令“讲清楚”的3人。看管小分队三班轮番逼、供、信，市公安局副局长王贵玉被整得终身致残。直到1980年9月还未纠正“清查扩大化”造成的严重后果。

陈永贵也以胜利者姿态出现。他向张怀英说：“谢振华整我的黑材料，说我是叛徒，他没资格。”他以为，只要有毛泽东保驾，他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没想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紧接着粉碎了“四人帮”，又批判“两个凡是”，陈永贵领导的大寨被作为极“左”典型而受到批判。

陈永贵于1986年3月26日在北京病逝。按说已经盖棺论定，但他的历史问题仍被人议论。1992年出版的《谢振华回忆文集》中写到陈永贵历史问题时说：“很清楚，有人证、物证和本人也承认，他确实自首叛变，又当了特务情报员。但事隔几年，陈永贵摇身一变，在主持省委扩大会议期间，竟逼着我承认整他的黑材料，企图置我于死地，杀人灭口，以隐瞒他的罪恶历史。”

政治领导人物的历史应该有透明度，让广大群众都知道。如果陈永贵的历史问题一旦发现，就告诉广大群众，也让他本人向公众说个明白，要群众理解他，他不至于背这么多年的历史包袱，也不至于身后有人再写文章数落他。更重要的是不要因“黑材料事件”让“保”他的干部群众与“揭”他的干部群众斗得死去活来。

把“黑”材料变成“白”材料之时，就是中国民主化实现之日。

□ 摘自《炎黄春秋》1999年第5期

~~~~~

【岁月风声】

王洪文胞弟王洪武谈家事

• 峻 宏 •

“四人帮”之一的王洪文已经死去多年，同那段历史一样，“王洪文”3个字也变成了历史。同70年代在中国政坛上红极一时、横行一时的王洪文不同的是，他那祖祖辈辈以土地、耕牛为生的亲人们，始终在东北的一个山村里，过着清贫而本份的乡间生活。王洪文权力鼎盛时，他们没有随之“鸡犬升天”；王洪文从政坛上跌落下来，他们的生活依然如故。

让王洪文老母亲至死遗憾的是，从王洪文17岁离家出走到离开人世，老母亲只见过他一面。王洪文在政治上的勃勃野心，让他的亲人们付出了骨肉分离的代价。

1932年，王洪文出生在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西新乡开源村。他的父亲叫王国胜，耳朵有点聋，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母亲王杨氏，生性胆小，为人谨慎善良。王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小时候，王洪文同那个年代大多数贫苦农民家的孩子一样，没读过书，只念了3个月的《百家姓》。10多岁时，他就给地主家放猪了。小时候的他长得白、文静、会说话，是村里公认的好孩子，很得乡邻们的喜爱。17岁那年，他参军离开家，除转业那年（1958）回过家乡一趟外，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了。他参军的第3年，父亲王国胜因肺病去世。他被押进秦城监狱的第5年，母亲王杨氏因脑血管破裂去世。

王洪文是长子，下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二弟叫王洪武。三弟叫王洪双，1958年参军，1962年转业到陕西省武功县飞机修配厂工作，现已退休了。四弟叫王洪全，在西新乡百家屯当农民，1996年因肺结核去世。妹妹叫王桂兰，在吉林市做家务。王洪文的弟姐妹及其后代，都是普通工人、农民。

开源村是西新乡较大也较富裕的村子，站在村前，我想象不出王洪文童年时村子的原貌。现在的开源村风景很美。村口于两年前建起仿古村门，村门一侧是水塘，水塘外是小河；另一侧是泛着鹅黄色的稻田，村门内就是绿树红瓦的村庄了。

几经打听，我终于找到了王洪文的二弟王洪武的家。王洪武与大儿子住在一起。王家正在吃中午饭，饭桌上是一盆白米饭和两盘炒土豆片、几个咸鸭蛋，几个孩子争抢着咸鸭蛋吃。听说我是来采访的，王洪武和他的妻子放下手中的碗筷，让我坐在炕上。为了不影响他们一家人吃饭，我从屋里走了出来。

王家住在村子的西头，除了他家是土房外，前后左右是一幢幢村民或新或旧的红砖大瓦房，房子整齐、漂亮。看着他家破旧的、几乎要倒塌的土房和一眼就能看得出的贫困家境，想着当

年王洪文在北京做党中央副主席时那副不可一世的样子，我心里竟涌起了一种历史感，仿佛听到了岁月的风声从耳边“嗖嗖”刮过。

◇ “从大哥当兵离开家到死，我只见过他两面。”

王洪武比王洪文小两岁，已经60多岁了。从脸形看，王洪武和王洪文很相像。王洪武的头发凌乱花白，脸上皱纹纵横，眼神有点发呆，说话有些木讷。王洪武的妻子是吉林省公主岭市大岭乡黄花屯人，瘦高，脸挺小，可以看出年轻时是很漂亮的。王洪武卷了一支叶子烟，吸了一口后，对我说：大哥“出事”后，家里很少来外人；前年有一个不知是什么身份的安徽人来我家里看看就走了，你是第二个来我家的外乡人。说过这些后，王洪武就简单地、面无表情地讲述王洪文的经历：王洪文入伍一个月便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卫国战争；回国后转业到上海棉纺织17厂当保卫科干事；“文化大革命”开始，王洪文造反，当上了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8月中旬到9月上旬，毛主席到南方视察，林彪杀害毛主席的阴谋败露，王洪文保卫毛主席，并协助南京军区清除了林彪死党；后来，毛主席把王洪文调到了中央；1976年10月，身为“四人帮”之一的王洪文被逮捕了，关在北京秦城监狱；1992年11月，王洪文因肝病死在秦城监狱。

说过这些，王洪武抬起昏花的老眼，接着说：“其实，我对大哥的了解很少，从大哥当兵离开家到死，我只见过他两面。自大哥离家后，父亲一面也没见到他，母亲在他转业那年回来时见过他一面。当时正是大跃进，大哥回来没呆几天就走了。”

1980年的一天，王洪武和他的弟弟妹妹突然接到可去北京看望大哥王洪文的通知。王洪武兄妹4人马上打点行装上路了。许多年来，王洪文很少和家里联系，也很少给家里写信，王洪文在北京的情况，王洪武和弟弟妹妹们基本上不知道。“四人帮”垮台时，听人传说，逮捕“四人帮”时开枪了，王洪文的胳膊被打断了，家人心里很害怕。因此，一路上，王洪武兄妹4人的心空悬着，谁也不说话。到北京后，他们和等在北京的大嫂见了面，然后一起去秦城监狱探望王洪文。

那次，他们和王洪文在一起呆了一天，上午2个小时，下午2个小时，总共4个小时。那天，他们早早就等在秦城监狱的接见室里。王洪文被叫出来，坐在他们对面。王洪武初见王洪文时曾有一阵感到陌生，但觉得眼前的大哥和电影、电视里出现的没什么两样，只是瘦了些，脸色苍白，有些浮肿。后来，王洪武看见大嫂流泪了，心里也涌起了酸楚。他拉了一下王洪文的胳膊，说：“大哥，听说抓你时开枪了，你的胳膊给打断了，是真的吗？”王洪文举了举胳膊，让他们看看自己的胳膊并没受伤，然后告诉他们，抓他时并没开枪，只是说开秘密会，不让带警卫员，去到会场就给抓起来了。王洪文叮嘱弟弟妹妹们要好好劳动，不要背包袱；叮嘱他们好好过日子，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母亲的身体。他说过这些后，话就很少了。

1974年9月，王洪武到大寨去参观，回来时路过北京，在北京住了一宿，想见见大哥。那天晚上，他在招待所里给大哥打电话，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打通了，是大哥的秘书接的。秘书说，王洪文没在，要想见王洪文得半夜以后。王洪武虽然十分想见大哥，但想到大哥那么忙，不忍再劳累他，于是打消了见他的想法，第二天就回长春去了。

在秦城监狱同大哥说话时，王洪武说起那年到北京想看他的事，王洪文眼里闪出了亮光，问了王洪武在北京给他打电话的具体日期，细算了算时间，然后对王洪武说，那天他在北京，可是秘书没告诉他说他弟弟来了。说完，王洪文眼神里流露出遗憾。

王洪武兄妹4人从秦城监狱看了大哥回来的第二年，即1981年，王洪文的母亲就因脑



血管破裂去世了。

◇ “我们没沾王洪文的光”

同王洪文的父亲一样，王洪武也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早些年在村里当过队长，后来又当了村里的治保主任。王洪文进了北京后，王家在当地成了旺族，王洪武也成了让人刮目相看的人物，常常有村里乡里的人来请他出去帮着办事。他到哪里，只要一说是王洪文的弟弟，想办的事立刻就办成了。那些年，他帮着村里乡里办了许多事，给乡里买过一台汽车，还买过其他便宜的农用、建筑用的生产资料等等。王洪文的母亲也受到了村里乡里人的尊敬，乡里有许多次开会，都把王洪文的母亲请去，让老太太坐在主席台的正中，上台下台、上厕所都让红卫兵搀扶着，一口一个“王奶奶”地叫着。

1974年，王家扒了旧房想盖新房，王洪武托人买来砖瓦、木料。房架子、门窗都做好了，村里说要帮着盖房子。王洪武的母亲做事小心谨慎，不同意村里帮着盖，怕有什么影响。可村里却非要帮着盖不可。为此，盖房的事就这么僵持着，一拖就拖了一个多月，最后，还是村里帮着给盖上了。

王洪文在北京被捕后，王家压力很大。王洪文刚被抓起来，村里就来人撵王家的人搬出家门，并拿着铁镐、二齿子把王家4间房子给扒了，扒下来的砖瓦木料全拉走了。

王洪文的母亲和弟弟王洪武平时为人挺好，房子被扒了后，没了住的地方，村民们见状主动帮王洪武盖房子。王洪武已没钱再盖砖挂面的房子了，只好盖了3间土房。王家就在这3间土房里住了20多年，一直没有能力再盖新房。

因受王洪文的影响，王洪武的村治保主任的职务很快就给撤了下来。

曾听人传说：王洪文在北京当党中央副主席时，国家曾给过王洪文母亲一些钱。从市内到西新乡再到开源村的这条路也是因为王洪文的缘故而专门修的。采访时，我把两件事提出来问王洪武和他的妻子。关于修路，王洪武想也没想就回答说：“路是修了，当年不是柏油路，是用山皮土修的。但不是因为王洪文出生在开源村才修的，就算王洪文不在这个村出生，路也要修。”至于国家给王洪文母亲钱一事，王洪武的妻子说：当时听人传说国家给钱了，但我们没花着，没人把钱给到我们手里。

◇ “大嫂回来过许多次”

王洪文的妻子叫崔根娣，是上海棉纺织17厂的工人。她家在上海，父亲、母亲都是工人。她同王洪文结婚后生有两男一女，大的是女儿，如今，3个孩子都在上海工作。

崔根娣跟王洪文老家的弟妹们格外亲。王洪文被押秦城监狱后，她多次给王洪文的弟弟、妹妹写信，还多次从上海回开源村。每次回开源村，她都从上海坐车到长春，再从长春到吉林市，先在王洪文的妹妹家住些日子，然后再回到长春市西新乡。那时，从西新乡到开源村的路不好走，没通车，三四公里的路程崔根娣要走一个多小时。

崔根娣最近一次回开源村是1995年夏天。她在吉林市、百家屯、开源村共住了3个月，在王洪武家时，崔根娣就住在西屋，她自己把凌乱的屋子打扫打扫就住下了。她不怕蚊子咬，不怕苍蝇多，与王洪武的妻子很谈得来。吃饭时，王洪武家吃什么她就跟着吃什么，只是不吃没做熟的菜。有时她还亲自动手和王洪武的妻子一起做菜做饭。

王洪武的妻子说：“大嫂在上海家里也不宽裕，她总想着到农村来住，还想在农村养猪、养鸡，或养些值钱的东西。”停了停，王洪武的妻子又说：“大嫂说她今年还回来，可是，现在快到9月份了还没回来，怕是不能回来了。”

王洪武瞅着窗外的远方，那样子好像是在看大嫂回来了没有。

采访结束了，我问王洪武，家里有没有王洪文小时候的照片和他们母亲的照片，王洪武说没有。王洪武说：母亲去世时，本想给母亲照张相，但后来没照。王洪武送我出来时，我同他唠了几句家常话，知道他家种着10亩地，够吃用的了。王洪武还对我说，他大儿媳妇在乡里的绒布厂上班，一月下来可挣510多元。

~~~~~

## 【人间沧桑】

孙玉国：昨天和今天

• 小 斌 •

(一)

一九六九年三月，珍宝岛的硝烟刚刚散去，四月一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孙玉国从解放军最基层、偏远的乌苏里江畔的边防站，走进万众瞩目的人民大会堂，成为“九大”代表。

当他登上人民大会堂讲台的时候，腿有些发颤，心剧烈跳着，此时此刻，他处在全中国中心的中心，面对的是来自全国各地各个阶层的一千五百多名代表，其中有不少是他早就崇敬的社会名流。

当孙玉国用激动的声音讲到珍宝岛战斗的过程时，心情渐渐趋于平静，充溢胸间的是一种自豪感，他可以问心无愧地宣称，他在保卫祖国领土的战斗中是勇敢的，那些日子，他极有可能尸埋荒岛，瞑目大江。他迎着炮火从死亡中走过来了；他向往荣誉，从他背着母亲偷偷当兵那天起，就向往着成为一名功臣。

“九大”前夕，毛泽东提议，要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和中印边界反击战、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代表赴京参加“九大”。于是，参加“九大”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了孙玉国的头上。当孙玉国讲到三月二日全歼入侵珍宝岛的苏军时，毛泽东从座位上巍然地站起来，为孙玉国鼓掌，紧接着，场内代表群起应之，立即掌声雷动。

休息时，周恩来总理走到孙玉国的身边，提醒道：“你在发言当中毛主席起来为你鼓掌，你要过去致敬握手哩！”“去向他老人家致敬握手？”“战斗英雄，勇敢些嘛！”

孙玉国的发言，使“九大”会议进入了一个激动人心的高潮。当孙玉国讲到苏制62坦克被炸瘫在我国内河以及三月十五日战斗情况的时候，毛泽东又站了起来，会场内骤然响起的是有节奏的掌声。孙玉国被强烈的感情撞击着，他壮着胆子走向主席台正中，高喊一声“毛主席万岁！”然后，他正规地行军礼，握住了毛泽东伸过来的手。

一个人得志时最易失控，孙玉国一时变得异常亢奋，又沿着主席台的左侧走去，那时坐在主席台左侧的是林彪、江青、张春桥、黄永胜等人，他高呼口号，场内骤然响起的是有节奏的掌声，他一一走到他们面前，喊一句口号，行一个礼，并同这个人握一下手。虽然孙玉国是中等身材，并不显得很高大，但这一幕热烈的场面给广大群众留下的印象那么深，那么强！电视灯光和摄像机真实地记录下他在那些领导人面前的表演，多少年后仍然记忆犹新！

孙玉国披着太阳的光辉回来了，战友们瞪眼问他：“你握完毛主席的手后，为什么只去握主席台左边人的手？”“我要从左边下台呀。”孙玉国好像并没有意识到什么。

## （二）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孙玉国等十位同志“战斗英雄”称号。在那形而上学猖獗的年代，他的提升都是跨越式的，从连级干部直接任命为边防团副团长。

珍宝岛战斗轰动全国，那些日子，他无法在团里安安稳稳呆着，做副团具体工作。天南海北全中国到处有单位邀请他开会、作报告、讲演，乌鲁木齐、上海、成都、济南……。全中国主要城市巡回演讲一圈后，他被告知自己的“副”字取消了。

“你现在是团长了。”“我是团长了？”他成了名誉团长，频频进城开会，周游各地讲演，真正在家主持工作的是他的副手。

一九七三年，一道新的命令，孙玉国被直接提升为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在这个职位上还没等把下属师团干部认识全，又继续升迁了。

一九七四年，孙玉国被提拔到沈阳军区任副司令员，年仅三十三岁。孙玉国回到家乡沈阳来了。与妻子整整七年牛郎织女的生活结束了，她是泪流满面地迎接他的。他们从一个普通群众的住宅搬进了一所独门独院的日本式小楼，上下八间，除此之外，他们的住处内还配有厨房、厕所、卫生间、仓库、小车库。院内绿荫荫的葡萄架和一畦畦菜地，使这里幽静清新如同田园别墅。

身居高位、宦途坦荡，他却变得越来越小心谨慎，原来的那个豁达、开朗、直率的孙玉国不见了。孙玉国的气派逐渐大起来，他冬季喜欢穿大衣，外出视察部队时喜欢把大衣披在肩上，一副潇洒的风度。他的火气也奇怪地大了，一旦忤逆了他的意志，他会毫不客气地训斥自己的下属，哪怕他自认为很谦恭。

一九七四年，他被调到北京参加中央第三期读书班——也就是“四人帮”办的所谓“虎班”。人们预感到，孙玉国又要高升了。这是他的人生峰巅，同时，也临近了悬崖的边缘。

一九七七年七月一日，经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孙玉国被勒令停职审查，同年十月五日，经党中央批准免去其军区副司令员职务。

## （三）

孙玉国有位很值得骄傲的妻子，她名叫孙国珍，两个人的名字天造地设般地巧合，竟有两个字相同。一九六七年，经孙玉国的嫂子介绍，她认识了从乌苏里江畔珍宝岛边防站回家沈阳探亲的孙玉国。

一九六八年金秋十月，孙玉国从边防回到家乡完婚。婚礼再简单不过了，他穿了一身军装，只是领章换了副新的；国珍还是往常的一件衣服，熨烫得平平整整。“新房”设在孙玉国哥哥家临时腾出的一个小屋里，家具是从亲戚家里搬来的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有人笑她的婚礼太寒酸了，尤其是有人听说新娘连孙玉国一月挣多少钱都不知道的时候，不禁瞠目结舌。这是怎样的一个姑娘。因为她迷恋着现代军人，在孙玉国身上倾注了深深的爱。蜜月还没有度完，孙玉国就急匆匆返回了边防，孙玉国走后，她就搬回了娘家，并把婆婆接到了家里，婆婆、爷爷、妈妈、姐姐、弟弟生活在一起，她成了这个大家庭的主妇。

珍宝岛一仗轰动了世界，她还不知道孙玉国是死是活。四月一日，她打开收音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播送党的“九大”代表名单，她听到“孙玉国”的名字，她怀疑自己听错了，是幻觉，是臆想吧？因为这些日子她常常在梦中呼唤他。她马上告诉全家人这个消息，大家一起第二次收听新闻节目，全家人证实，是孙玉国！她再也控制不住了，趴在婆婆的膝上，让泪水尽情地流了出来……。

夫贵妻荣。一时间，她好像也成了英雄，人们对她另眼相看，恭维、钦慕、爱护、推崇，犹如冬夜过去，突然迎来了火热的夏天。可是她却有一个最朴素的信条：他是我，我是我！丈夫出名之后的她对别人说话，仍是那样面带微笑，客客气气。

孙玉国被审查前期，不允许她和他见面，她就每隔三五天必发一封信去，鼓励他正视自己的错误，勇敢地去剔除自身的毒瘤。半年以后，组织批准他们夫妻可以每星期见一次面，她不管刮风下雨，再忙再累，每个星期天都挤出半天时间去孙玉国那里，她一遍一遍地叮嘱：“玉国，只要对党忠诚，仍会有路。”

孙玉国万分感激自己妻子。但他的这种情绪很快便被负有重责又暂时无力解脱而深深的内疚和仇恨自己的浪潮所淹没。一天，儿子从学校哼着歌闯进家门，挥着小手喊着：爸爸，学校要填表！”孙玉国接过一看，是让学生填写家庭关系的表格，他脸色阴沉下来，许久说不出话。他见儿子在父亲栏里写了他的名字，咬咬嘴唇说：“不要写爸爸。”“为什么？”儿子瞪着稚气的大眼。“不要写爸爸！”孙玉国难过地狠狠说道。

儿子既怕又伤心地呜呜哭了。孙玉国赶忙哄起孩子：“听话，你就说，我爸爸死了。”儿子反而哭得更厉害了。妻子闻声从厨房走来，抓着儿子的手：“写吧，你有爸爸，叫孙玉国。”

这时，屋里静极了，只有身后儿子写字的笔磨擦纸的声音。妻子在向他靠拢，一颗心在向他移动，他虽然没有转过脸，但已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了。“玉国，孩子不能没爸爸！”

泪滴，她一定看到了！

#### （四）

等待处理分配的岁月，是孙玉国最难熬的日子。后来他终于被分配到一家工厂工作。孙玉国分配到的这家工厂，虽属沈阳，地理位置却在九门八关之外的远郊。

这个新的工作岗位对他来说的确太陌生了，他等待着被工人们嘲笑。他想象着，一群群缺乏修养的青年又会像看公园里的珍奇动物一样围拢过来指点着他，想到要在讥讽、白眼、难堪的处境中工作下去，他有些不寒而栗。

然而，他的猜想错了。

孙玉国来到工厂的第一天，厂子里出乎意料地平静，怎么没有人在背后窃窃私语？怎么没有人从门玻璃中张望？他反而觉得有些不正常了，但他最终明白过来：是工人们理解他。

厂里的政委齐水发陪他在厂子里的小食堂就餐，孙玉国起初以为这是厂领导的食堂，几天后，齐政委不见了，他注意观察，发现齐政委与工人们一块儿在大食堂排队用饭票买饭菜，再问小灶厨师，原来小食堂是用来招待客人的。

他的写字台，是从别处调来的。他需要午间休息，厂子里专给他安排了一个单间。他搬家时，主动来了一伙儿还一时叫不出姓名的工人……。

“我们甩几把老K吧！”休息时，工人们拽他。

“我不会玩！”其实他在边防部队玩得比谁都凶。

“我们教你。”

“我们喝两盅吧！”星期天，工人们拽他。

“我不会喝。”其实他在乌苏里江的冬天能喝半斤白酒。

“当工人不会喝酒哪行，我们教你！”

他胆战心惊地玩，胆战心惊地喝，工人们火了：“你看得起我们吗？如果你看得起我们，就别像套中人一样活着！”

他心中的那面鼓被重锤敲击着，怨恨自己的怯懦和虚伪。

一天，他和工人们干活时，突然一个人停下，捅捅工友，继而大家都惊奇地瞅着他。孙玉国问：“出什么事了？”

那个工人说：“你刚才笑了！”

哦，他多少天呆板的面孔，今天无意识地笑了，这是一种乐观、向往未来的自然流露，他要感谢生活，感谢工人们！

他找到齐政委。

“政委，我看差不多了吧？”

“什么呀？”

“你买饭，我也买饭，你住哪儿，我也住哪儿。下个月，让我跟工人一块儿上下班！”

孙玉国精力充沛地在工厂奔忙着，他负责行政、后勤工作，直接接触群众，别人都说这工作众口难调，诸如房子问题、子女就业问题、工人补调粮油问题和浴池、车队、俱乐部等等问题，会把一个人搞得焦头烂额。累死也落个一身不是，怨声载道。

可工人们渐渐对孙玉国另眼相看了，他到了工厂不久，任厂“调整工资委员会”主任。

他的工资级别很低，长级的名单公布之后，里面根本没有他的名字。即便如此，在任何场合里工人们也没见过他露过一丝懊恼的表情，那些天，他又脚不停歇地跑市公安局、区公安局、派出所，按照政策，解决了一件建厂以来没有解决过的大事——使十八户老工人家属的农村户口转成非农村户口。

家宴的邀请，他谢绝了，呈送的礼物，他拒收。他从不与工人们谈自己的珍宝岛功绩。如今，他更不愿让人看重他为工人们做出的一点事情。

这年四月，工厂与全国知名的改革家王亚忱所在的朝阳重型机械厂签订了帮助生产砧板的合同，铸造复杂、工艺要求高、任务量大，工人们急需一位领导来车间坐阵。孙玉国戴上白色塑料安全帽，蹲点到了一车间。全车间造型、天车、清理、热处理等各个班组，他轮班跟着干，有的工人偷偷记着，他握起二十磅的大锤，一抡一天，用大板锹甩造型砂，他连甩五吨……。中午吃饭，他却躲在空荡荡地车间一角，啃两个自带的凉馒头。

当时，他基本工资只有七十元人民币，妻子四十元，抚养两个孩子，生活的拮据可想而知。对于这一点，他从不向工人透露。一些人认为他是一个富户，看到他进车间，呼地围上去把他兜里的烟摸了净光，孙玉国毫不吝啬地又在帽子里或者背兜里掏出一盒，苦累、艰难，都被一种劳动者的自豪感所淹没了。

妻子刚刚买了几盒好烟，留着过节给孙玉国抽，却听说他要戒烟，大为惊讶：“你烟瘾那么大，抽烟的历史比孩子的年龄都长，说戒就戒了？说笑话吧！”

“不，是真的。”孙玉国向妻子亮出心里话：“我要通过戒烟给自己长两级工资。”

妻子听说，心一动，头扭向一边，是啊，现在家里精打细算地生活，每到发工资时，手头都紧巴巴的，遇到换季孩子添衣或家里来了人，常常要红着脸敲开邻居家的门借债。孙玉国每月几条烟钱，的确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

工人们不知这些内情，但他们不久便了解到，是孙玉国的经济状况已经不允许他抽烟了，这时他们才联想起这两年厂里供应面、油之类的副食，孙玉国都悄悄地离开，起初人们以为这些东西孙玉国是不缺的，现在他们才明白，原来是买不起。

“玉国厂长（后来，他经过考试成为厂长），来，抽烟！”“不，我已经戒烟了。”孙玉国抿嘴做一个狠狠的动作。

“嗯，抽我的烟！不抽，你就不是我们的厂长！”

工人们开始主动给他递烟，当孙玉国离开工人走进办公室时，一摸兜，怎么有一包烟？有人偷偷往他兜里放烟！

他想方设法找到了烟主人，感激他么？工人是不需要他感激的。退还么？工人会生气的，说什么呢？他要说，他戒烟并不仅仅是经济原因，真正的原因，他想从烟雾中彻底走出来！

自从进到工厂任职，孙玉国就想着一件事，尽快成为内行，尽快学会管理，这是重新站起来的的第一步。一九八五年七月，孙玉国参加锦州全国厂长统考。从考场回来，他寝食不安，食不甘味。自己能是一名合格的厂长吗？全厂的工人们都在眼睁睁地看着他呢！

他急不可待地给老师去了一封信，说：“老师，由于我的特殊情况和心绪，很想快些知道自己考试的成绩。”还没有发榜，老师的信来了。

拆信的手在颤抖，信首一行大字耀花了他的眼睛：“孙玉国同志，祝贺你，你合格了……。”

办公桌对面的杨副厂长看激动的样子，问：“什么事这么高兴？”

孙玉国鼻一酸，像从胸膛里说出一句话：“我，合格了！是全国厂长统考！”

□ 《美洲文汇》第76期

~~~~~

## 【认识世界】

“文化大革命”前期人们眼中的中国和世界

• 翁有为 •

葛剑雄先生在其所作的《要是世界上只有中文》一文中（见《学术批评网》），谈到“文革”高潮中一位日本小商人与中国做生意而发财的事。这位日本小商人入中国境先高呼“毛主席万岁”，谈生意先“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胸佩毛主席像章，手持毛主席语录，其对毛主席的热爱表现，比之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也毫不逊色。这在中国人看来，与这位“无限热爱毛主席、坚决支持文化大革命”的“国际友人”谈生意，自然应先算政治帐，只要对世界革命有利，少赚点钱，就是赔钱，也是值得的。读之，不禁令人感慨：如此受人之骗，何其愚也！

葛文中所说的“‘文革’高潮”，其时间至迟也应在1969年之前。因为在此前后，一是红卫兵运动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自行泯灭，二是全国局势也因各省先后建立革命委员会而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三是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中共九大进行了高层权力再分配，以造反和夺权为中心的“文革”高潮期已经结束。在“文革”高潮期，中国人“左”视眼中的中国和世界是什么样的呢？也就是说，中国在上应处于何种位置、担当何种角色呢？以今天的历史观点去考察，显然当时的认识和看法是不够清醒的，与当时世界局势的实际是相脱离的。

1967年6月，一个叫做“红代会归国留学生红卫兵勤务站”的造反派组织，编写了一本《毛主席是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以下简称《红太阳》）的小册子。该小册子共分三部份：第一部份的标题是“世界人民无限热爱、无限敬仰伟大领袖毛主席”；第二部份的标题是“毛主席著作是世界革命人民的命根子”；第三部份的标题是“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鼓舞着全世界革命人民”。三个部份共编有171个短篇故事，这些故事是从留学生提供的“在国外所见所闻的、大量的、生动的各国人民热爱毛主席的材料”中选取的“一部份比较有代表性的感人事例”。这些故事表现的主题和中心是：毛主席是世界革命的领袖，是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要准确理解该书故事所表达的思想，有必要考察那个时代所倡导的“世界革命”理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正式通过了“世界革命”的理论。1966年8月12日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指出，“当前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的时代”。“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8年，第79页）1966年10月，毛主席在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中，认为“现在正处于世界革命的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一定要建立起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页）

当时，中国虽呼唤“世界革命”，而事实上正忙于搞国内的“文化大革命”，哪有精力和时间去策动世界革命呢？而且，如有的学者分析的那样，中国仍坚持“革命不能输出”的观点，绝不派一兵一卒去国外代替别国人民推翻其国内的资产阶级政权。（谢益显：《当代中国外交思

想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页）因此，“世界革命”的思想，在决策者的心目中，也只停留在“思想”的范围内，仅发表一些有关的文章、声明和讲话而已。但在满怀“文化大革命”激情、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激进群众尤其青年学生中，则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作为世界革命的首要内容，而且，力图把对毛泽东的崇拜、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的革命思想和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输出到世界各国去。

在《红太阳》一书中，讲述对毛泽东崇拜的就有77个短篇故事，其题目所用的崇拜话语十分典型，如“毛主席就是当代的列宁”、“他（毛泽东）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毛主席也是我们古巴人民的领袖”、“毛主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万岁”、“珍贵的毛主席像章”、“不让毛主席像章沾上一粒灰土”、“永远佩戴毛主席像章”、“我爱毛主席”、“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向往中国，想念毛泽东”、“朝拜毛主席”、“毛主席离我们的心窝更近了”、“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海可枯，石可烂，热爱毛主席的心永不变”等。其内容讲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是如何热爱毛主席的，如“买戒指的故事”讲的是，一位戴毛主席像章的老挝青年去商店买戒指，由于价钱关系店员不肯卖，但当店员看到青年胸前戴着的主席像章时，店员对青年忙改口说：“请你把这枚毛主席像章给我吧，我可以白送你这支戒指。”青年回答：“不！就是你的戒指是金的，我也不能把毛主席像章摘下送你。”说完，青年立刻走出商店。（《毛主席是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第33—34页）

在《红太阳》一书中，讲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有53个短篇故事，“文革”话语及表现手法十分明显，如“一定要好好地读”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位年青的老挝解放军战士在被美国飞机的枪弹击中倒在血泊中，“他意识到自己已经不行了，便用尽全力，把手伸到怀里，掏出了他那本已经被鲜血染得通红的《毛主席选集》，递给身旁的一位战友。他一字一字诚恳地嘱咐战友说：‘一定要好好地读。’说完，就闭上了眼”。（同上书，第74页）在“革命宝书播火种”这个故事中，讲有两位印度海员趁机乘轮船到广州时，“把一封用血写成的信交给了我国的港口译员。信的内容是：我们渴望得到一部世界上最宝贵的——毛泽东的著作！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书同上，第90页）

在《红太阳》一书中，讲“文化大革命”对世界革命的影响的有41个短篇。其中一篇标题是“有毛主席领导，世界革命一定胜利”讲的是“文革”对日本的影响。故事说日中友好协会（正统）神奈川县总部理事长望月登向东方通讯社记者发表谈话指出：“在我们日本，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人民，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受到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大鼓舞”，“打出了一个革命的新局面”。他认为：“毛主席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也是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不仅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吹响了进军号，也为全世界革命人民吹响了反帝反修的进军号”。（书同上，第118页）在讲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那一部份里，有一个讲日本留学生学习毛主席著作、后来参加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故事。故事说：在东欧的某国学习的几个日本留学生经常和在那里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一个日本留学生于1966年暑假毕业时写的毕业论文，就是用毛泽东思想分析和批判某国修正主义经济体制的。这几位日本留学生毕业后没有回到日本去，而是到中国参加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1967年初，上述那几位中国留学生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见到了在中国的几位日本留学生，“每人都穿着中式服装，腰里扎了一根皮带，手里拿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和我们的红卫兵小将一模一样。一见中国同学的面，他们就挥动着语录本，用流利的中文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他们表示不久要回日本了，他们说回去后，“我们要自己闹革命，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日本”。（书同上，第83—84页）

今天的读者有的可能怀疑这本书里所载故事的真实程度。笔者认为，这些故事，肯定有夸张的成份，有不实的地方，但也没有根据和理由说是作者和编者凭空杜撰出来的；从这些故事



的时代背景来看，这些故事也确实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中国人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以及外国一些比较激进的人对中国的看法。就外国对中国的看法，如日本左翼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就持赞成和支持的态度，这确是事实。笔者最近在《史学月刊》本年第三期编发了张雅晶博士撰写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日本人的文革论》，有关于日本左翼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持赞成和支持态度较为系统的归纳。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看，日本左翼对大陆中国的正面舆论宣传，促进了中日关系的发展，是70年代中日恢复邦交的重要一因。也就是说，日本左翼人士对大陆中国的赞成和支持是真诚的，正如有的学者分析的那样，“使日本人惊叹的是，新中国不仅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赶走了外国势力，还让吃不饱、穿不暖的数亿人民当家作主。再加上当时访华日人归国后宣传‘中国没有乞丐’、‘没有小偷’、‘没有苍蝇’等，从而加深了日本人对中国的好感。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不少日本人，尤其是传媒和知识分子，往往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和宣传，以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引见前述张雅晶文）使日本人对中国好感的，主要是中国的国家独立、社会公正；而当时尚处于经济快速发展初期的日本的各种矛盾一时得不到解决，于是一些人便把其抱负寄托于中国的革命里。所以他们感到中国伟大、毛泽东伟大，甚至对毛泽东崇拜，也是自然的。《红太阳》一书里的日本人对中国和“文革”的态度，甚至葛剑雄先生文章里的日本商人对“文革”、对毛泽东的态度和行为，在那时的日本左翼人士看来，应该是可以理解的，至少也不是荒唐的。

至于亚非拉新独立的民族国家的人民对中国和毛泽东的认识，在《红太阳》中有夸张，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那个时代新独立的民族国家的人民与中国的关系。中国对新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支持和援助是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从原则讲是先算政治帐，后算经济帐，甚至不算经济帐，无偿援助。从今天看，这种做法，可谓愚矣！而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排斥在联合国外，身受超级大国的挤压，如果不联合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怎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自己的作用？而要联合新独立的国家和正在进行独立革命的国家，当然离不开对他们的支持。也就是说，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支持和援助，既是基于世界革命的理念，也是出于国际统一战线策略的需要，而且主要应该是后者。正是由于中国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实施和发展，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高，作用越来越大，中国被广大发展中国家看作是他们的利益的代言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在中国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用当时形像的说法，中国在70年代初被黑人朋友们“抬”进了联合国。从今天的情况看，如果那个时代中国大陆进不了联合国，到80年代和90年代再去加入，就更困难、更被动了。无论如何评价，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说，大陆70年代进入联合国的功绩都不为高。而这功绩的取得，就有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功劳。当然，亚非拉民族国家对于中国的这种功劳，是和中国对其真诚地支持甚至是无私地援助分不开的。

当然，今天的国际形势与上世纪60—70年代相比，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然没有必要固守那时的做法。那时的一些做法，当时并不一定就正确，今天看则不免显得有些愚蠢和荒唐而令人不可思议。但考之那个时代，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所谓智与愚，有时也是相对其所处的环境提供的可能或条件来说的。

与毛泽东在国内“文化革命”问题上的错误和失误相比，其对国际问题的分析和认识要清醒得多。毛泽东曾直言说他在世界革命问题的主张是“放空炮”。（谢益显：《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页）苏、美强，日本和欧洲富，中国还落后，是穷国，这是毛泽东难以忘怀的。在这样一种压力下，毛泽东不能不清醒和谨慎。毛泽东多次在和外宾谈话时说中国还落后，还很穷。他也不同意把他说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这一说法。1967年12月29日，他在修改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稿时，在“衷心祝愿我们的伟大导师、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这句话中，删掉了“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这一限定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6页）1970年12月6日，他在一个批示中指出：“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对内对外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加以克服”。（马齐彬等：《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

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338页）毛泽东对外是谦虚的，而事实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家倒是真诚地把毛泽东尊为导师。1970年6月24日，苏丹财政部长曼苏尔·马哈古卜率团访华会见毛泽东时，对毛泽东说：“人民已经起来，毛主席的教导在全世界已经传播开了。人们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理解了毛主席的话，懂得真理应当属于自己，所以人民一定会起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106页）这些话，真实地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毛泽东和毛泽东中国的看法。

□ 原载开封《史学月刊》2001 / 05

~~~~~

## 【了解中国】

我见到了周恩来、张春桥和王洪文

• 郭 莹 •

1971年7月和8月，我作为加拿大政府代表团的一员，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访问了中国。我们是自1949年后第二个北美政府访华代表团。第一个是1970年，美国乒乓球队访问北京的“友谊比赛”破冰之旅。我们这个代表团是受中国政府委托，经由北美“关心亚洲问题研究委员会”出面组织的，共13名团员。来中国前我当时在美国伯克莱大学中文系做研究生，并曾在香港学过汉语。代表团抵达北京后由中国外交部负责接待，外交部官员热情地表示：“我们很重视你们的来访，希望大家随处走走看看，多些了解中国。”事实上，我发现这句话当真正实践起来时，是多么地困难重重甚至相当冒险。

### ◇ 被押到派出所

到达南京后的第二天清晨，我与一同伴走出饭店去外面闲逛，溜达着就拐进了新街口附近的一条居民小巷。居民大院门外的树阴下，几位老人正在闲聊和下象棋。小巷里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风情，对我这个初来乍到的西方人来说相当新鲜和具东方魅力，于是我举起照相机拍了几张民居、街景和老人们的聚会照。就在我端着相机兴致勃勃地拍照时，那几位老人突然一拥而上吵吵嚷嚷着夺下了我的相机。这时立即围上来数十人，大家情绪愤怒地斥责我“居心叵测地拍摄中国的阴暗面。”在一群人民群众的押解下，我俩被带到了当地派出所。办公室里值班的警察拿过我的相机翻来覆去地摆弄着，我紧张得心提到了嗓子眼，我担心警察会因我的反革命行为而销毁我的胶卷，那样我这些天中国之行的素材就全毁了。谢天谢地他终没打开相机盖，我松了口气。接下来警察首先问我们是哪国人。我答“加拿大”。他从未听说过这个国家，就问：“这是什么国家？在哪里？”我答：“在北美。”警察警惕起来尖着嗓门惊叫：“你是个美帝国主义分子。”我吓得直哆嗦，忙急中生智地解释：“我不是美帝国主义，我是加拿大人，在美国的北方，是另一个独立的国家。你知道白求恩大夫吗？他就是加拿大人。”警察一听到白求恩这个名字态度立即缓和了一些。他又问：“你是白求恩大夫的亲戚吗？”我十分吃惊地回答：“我不是白求恩大夫的亲戚，只是他的同胞。”他感兴趣地追问：“那你是不是像白求恩一样，受外国共产党的派遣来支持中国革命的。”我只好又一次否认。于是警察态度严肃地指责我说：“首先你没经过中国政府的批准就随便拍摄，这是犯罪行为。第二，你不去拍我们的大好河山、不去拍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的新风貌、不去拍我们人民群众抓革命、促生产的冲天干劲，却偏偏钻进中国落后的小巷内，故意拍摄我们的阴暗面，你这是妄图别有用心地诬蔑我国。”我听不懂他这一连串的政治术语和政治罪名，但我心惊胆战地意识到自己显然罪责深重。我想起中国外交部官员的话，于是我打算试试救自己。我的同伴听不懂汉语，只得呆立在一旁紧张地看着群情激愤的中国人，显出十足的恐惧。我建议警察给我们下榻的饭店打电话，外交部的陪同官员会向你解释清楚。到了午餐时分，外交部官员终于赶来派出所将我们营救了出来，至此我

俩已被扣押了整整一个上午。临出门前警察说：“你要接受教训，下次拍照前得先经过我们政府的批准。而且应多拍些能体现中国社会主义大好形势光明的方面和先进模范人物。这次看在你是白求恩大夫的亲人面子上放了你们。”

◇ 周恩来开明健谈，张春桥、王洪文一直黑着脸

我们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周恩来总理的，周总理迎在门口与大家一一握手，他因在延安骑马时右臂受过伤，所以他边用左手与每一位握手边说：“欢迎你们来中国，你们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在当时文革险峻的政治形势下，一片打倒美帝、打倒苏修的极“左”狂潮下，周的这番表态十分鼓舞我们。当时在周恩来左右两侧作陪的是张春桥和王洪文，这两人没与大家一一握手，3个小时的会见中他俩自始至终几乎一言不发，神情也十分阴沉不苟言笑。给我的印象是，这两位文革风云人物好似被迫出席此次外事公务，一副不情愿的样子。周恩来问我在什么地方学的汉语，我答“在伯克莱（Berkeley）大学读汉学研究生。”他马上极有兴趣地询问伯克莱这所西方名校的情况，及西方汉学教学研究现状，还特别关心我学习汉语的困难。当周得知我此次是从香港进入大陆的时，便关切地询问：“香港怎么样？我们很关心香港的情况。”我客气地回答：“香港是个好地方。”周说：“我们把香港看的很重要，香港最终我们是会收回来的。”周给我的印象是，十分健谈活跃、极其睿智和反应敏捷，且大度热情，令我们感觉是在与朋友交谈，一点也不拘谨。周谈话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每当我们谈到一些事情时，他都会先专注地洗耳恭听，待对方结束话语后周会迅速地作出反应。我们讨论每一个问题时，周最后都会直接、明确地对该问题作出表态和答复。他的每一个表态、答复，都鲜明、清楚地体现了他的原则或立场。整个会谈中，周从未含含糊糊地兜圈子或所答非所问，亦从未回避过任何问题。

记得周说：“你们下一次来中国的时候，我就不会在了。”当时闻此言甚为惊讶不明白何意，直到76年周逝世后回想起来，我猜测他那时是否已料到自己的癌症病魔来日不多了。提到台湾问题时，周答：“台湾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我注意到周的态度相当温和，没用当年流行的政治口号“一定要解放台湾。”周说：“我们始终都在关注着西方还有美国各方面的情况。请你们来访就是希望与西方人民、政党和社团，互相间增进了解和发展友谊。你们不久就会看到我们将与西方国家开展往来，中国也肯定将会对西方敞开国门。”周又特别强调地表示：“我对中国与西方及美国发展友好关系持乐观的态度。”

周还希望我们谈谈中国之行的观感。我们都回答：“很好。”这个回答的背景，一来是出于客气，更重要的则因为我们每天的参观日程都由中国官方安排陪同，所到之处都是经过精心策划布置的，当然我们所见、所闻、所吃、所玩都很满意。周是位有魅力的人，我甚至觉得周很喜欢西方人。他感兴趣地了解北美大学的情况。他也告诉我们他从前有过一些西方朋友，并充满感情地回忆了他自己与西方人的友谊，特别是他与白求恩的个人友谊。周还问我们在中国吃中餐的感受，很关心我们是否喜欢和是否习惯。代表团中有一位华侨，周问他祖籍是哪里人。他答：“广东中山人”。周马上说：“你知道吗，中山的篮球队满威风的。那里出足球名将，他们的个子也比较高。”周还关心西方人民反越战的形势，及加拿大、美国共产党的近况如何。他问有没有共产党人在北美的政府或国会内担任要位。我们回答，北美共产党的势力远达不到在政府及国会内任职的高度，共产党还是小党缺乏影响力。周为之十分感叹。我们又说，但西方人民反对越战的声势越来越高涨，要求政府停止越战的呼声已成为大潮流。周还询问了西方人民对政府的态度、意见，及反政府示威游行的趋势。

周又说：“我们现在还很落后，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所以我们还需要一步步的革命，这将会是长期艰巨的斗争。”我十分吃惊周的坦白，因这与中国媒体的宣传及中国官员的口径是那么不一样，他们皆通篇颂扬中国的大好形势和巨大成就，社会主义建设及人民生活水平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真正的国富民强。而在中国以外的西方世界里，还有三分

之二的受苦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周进一步说：“中国的事情很复杂，存在着许多不平衡和落后。这都需要一步步地来发展。”我明显感受到周对改革发展中国的雄心壮志，尽管他没有用“改革”这个他逝世后数年才出现的名词。同时我也明显地感受到周欲言又止的无奈与压力。周左右两侧的张春桥、王洪文黑着脸所释放出来的“沉默压力”，及这两位文革闯将对周一言一行的监视，在座的我们也都感受到了，可以想像周所遭遇的政治困境。我们继续发问“中国文革什么时候会结束？”周答：“文革是复杂的，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运动中有些事情做得太过份，文革中的一些情况我们控制不了。红卫兵太冒进，武斗太过份和失控。”然后周明显地不愿多讲，我感觉周对文革有意见。我们最后询问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如何，周答：“不错。”

周在3小时的会见中反复表示：“非常高兴见到你们，我们把你们当做朋友。我对中国与西方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持乐观态度。”周的诚恳、务实、健谈、友善以及他的智慧，还有他对西方及西方人的善意，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到处好吃好住好玩，眼见形势一片大好

我们曾向外交部提出会见毛泽东主席，中方回答是：“毛主席日理万机。”我们问毛的身体如何，答：“非常健康。”我们也提出见江青。回答“旗手的革命工作很忙。”我们又提出能否拜会林彪副主席，答：“林副主席也很忙。”

我们每天在中国的活动都由外交部人员安排和陪同。先后参观了苏州园林、上海豫园、广州烈士陵园。在南京参观了中山陵。南京市委官员介绍这个国民党时期的国都时说：“南京曾是敌特的老巢，这个城市的敌特斗争形势十分严峻，还隐藏着一些反革命分子。”另一则花絮是，在西安下榻的宾馆吃早餐时，厨师从里面走出来礼貌地询问我们想吃些什么，我们回答想吃中国菜。没料到厨师显现出非常非常吃惊的表情：“你们外国人想吃中餐？”我们答：“对呀，我们不是在中国吗。”他说以前来这里的外宾（我估计是苏联人），都要求他做地道的西式早餐。那顿早餐我们吃得津津有味，厨师瞧见我们喜欢他的厨艺高兴极了。只是端上来的食物太多了我们吃不下，对中国国情一无所知的我们，当时还以为中国人每天的早餐都是这么大的饭量，感叹中国人可真能大吃大喝。那时不知晓我们这些老外是在“搞特殊化”，还以为在中国所享受到的待遇就是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因中方给我们放过一部介绍中国人民生活的纪录片，有中国百姓围着餐桌吃晚饭的情景，画面上中国人个个开心地享受着丰盛的美味。我们感觉这些生活画面，与以往在西方所闻的中国人贫穷的谣言，那么不符。在中国旅行期间，由于中国人已很久没有见过西方人了，于是很多中国人没想到我们来自北美，他们以为苏联人又回来了。71年8月我们乘火车经过徐州时，车厢过道上一位母亲抱着个3岁的男孩。由于天气酷热我的衣领是敞开着，当我经过男孩身旁时，那男孩伸出手来一把揪住了我的胸毛。他就这么死死地抓着，瞪眼盯着这些奇怪的毛，我怎么哄他都不肯放手。这时男孩的父亲赶过来大声说：“快放手，他是个鬼。你要是抓住鬼不放手，这个鬼就会把你提走下地狱去喂恶魔。”那男孩听后吓得哇地一声嚎哭起来。我试图劝慰他，我一开口男孩更惊恐地浑身颤抖。

□ 本文是作者对一加拿大人的采访，节选自她的《换一双眼睛看自己——老外侃中国》

~~~~~

## 【史实辨析】

关于1975年整顿的若干史实和一个提法

• 程中原 •

《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3期发表了《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诞生前的酝酿》一文，其中有些史实不够准确。现大体上按史事发生的时间为序列举几例于下，供参考。

一、文章说：“1975年4月至6月间，在毛泽东支持下，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三次会议”，对江青等展开批评。

事实是，由于“四人帮”提出所谓反经验主义问题，毛泽东对“四人帮”进行批评，由此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有四次，而不是三次，其中有一次是毛泽东亲自召集并主持的。具体说来这四次会是：4月27日，政治局开会讨论毛泽东4月23日对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示，对江青等人进行了批评。会后，王洪文、江青很不服气，分别要求见毛泽东。毛泽东表示，要见请大家一起来。于是在5月3日亲自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批评江青等人的所谓反经验主义。毛泽东嘲讽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历数江青等人自批林批孔以来搞“三箭齐发”（批林批孔夹着批走后门），用个人名义送材料，到这次批判经验主义的错误，并当面告诫他们“不要搞四人帮”。这次会后，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政治局在5月27日和6月3日又接连开会，会议改由邓小平主持，专门对“四人帮”批评、帮助。江青、王洪文被迫作了口头和书面检讨。不久，王洪文就离开北京，自7月初起，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

二、文章说：“为了阐明和宣传整顿工作的指导思想，邓小平指示主持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的邓力群，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第一，《论总纲》并不是邓小平指示起草的。9月中旬，胡乔木按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讲话和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同志谈话的精神，从当时形势和实际需要出发，提出要写一篇关于全面宣传毛泽东的三项重要指示的文章，从理论上支持和阐发即将开展的全面整顿的方针。这篇文章由邓力群负责起草。10月7日此文完稿。《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个题目是邓力群确定的。第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是在1975年6月中旬由邓小平组建成立的，7月上旬正式开展工作。负责人为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于光远、邓力群。实际主持政研室工作的是胡乔木，但在那时的特定情况下，胡乔木也没有别的名义。

三、文章说：“1975年9月26日，胡耀邦就科学院有关问题向邓小平作了汇报。”

这话说得不确切，给人的印象似乎只是胡耀邦个人向邓小平汇报，谈的也只是科学院的有关问题。其实9月26日下午是一次正式的国务院会议，会议由邓小平主持，中心议题是讨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邓小平等国务院领导同志先听取了胡耀邦等人的汇报。对这个提纲的内容，只用“科学院有关问题”一语概括不了。因为它不单管科学，而且可以适用于文化教育各部门。

四、文章说：“《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等文件的下发和精神的传达贯彻，对于推动国民经济各行各业的整顿发挥了指导性作用。”

这一段话说得太笼统，不准确。这里提到的四个文件，只有《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是下发并广为宣传的。《论总纲》是准备做社论用的第一稿，当时没有发表；《工业二十条》正在讨论、修改过程中，也没有下发，可以说其精神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一定的贯彻；《汇报提纲》送毛泽东审阅，退了回来，也没有最后形成文件。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四人帮”把这三个文件诬蔑为三株大毒草，1976年8月印成小册子发行，要全国都来批判。本来并没有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见面的这三个文件，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传播到了全国人民

中间。与“四人帮”的愿望相反，人民群众读到这三个文件，都不认为是什么大毒草，反而更加认识到邓小平领导的整顿是正确的，三个文件集中表现的邓小平所主张的路线、方针、政策才真正反映了人民的意志和愿望，而掀起“批邓反右”浊浪的“四人帮”恰恰是反对人民群众和反对社会主义的一小撮。“四五”运动为后来的粉碎“四人帮”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这三个文件通过所谓大批判的方式为广大干部、群众所了解，则从思想上、理论上进一步巩固了这个基础。

五、文章说：“在1975年的整党中，主要狠抓了以下几项工作”，文章列举了“整顿好各级领导班子”、“反对派性”、“落实政策”三个方面。又说，整党“对各方面的整顿起了促进作用”。

作者对整党的表述用的都是已经进行方式，说明在作者看来，1975年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前，已经进行了“整党”；而整顿的几个主要方面也就是“整党”的主要工作。这样的认识和表述是不符合当时实际的。

显而易见，整顿领导班子、反对派性、落实政策和恢复健全规章制度等等，一开始就是铁路整顿的主要内容，也是其后钢铁整顿和工交战线整顿的主要内容。当然，这些方面可以是进行整党的内容，但与准备进行的整党并不能划等号，更不能说成是已经进行的整党所狠抓的工作。

在1975年整顿中，邓小平关于整党的思想和部署有一个形成的过程。邓小平在1975年7月4日同中央读书班学员讲话时就已提到，“毛泽东同志讲军队要整顿，整个党也有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党的领导和党的作风方面。”说明这时邓小平已经考虑要进行整党。到8月18日邓小平在讨论《工业二十条》的会议上讲话时，党要整顿的思想和部署已经明确。他说，不但各行各业要整顿，党也要整顿。还举出浙江的“双突”，说全国一些地区和单位不同程度地有这个问题，不整顿不行。不整顿，我们这个党就成问题；并明确指出，整党的时间在今冬明春。9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提出军队、地方、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科技、文艺等各个方面都要进行整顿。9月19日，邓小平听取了胡乔木关于准备写篇全面宣传三项指示的文章的汇报，除表示赞成外，又指示胡乔木：政研室再写两篇文章，一是关于党的作风，一是关于“双百”方针。并说：今冬明春要整党。接着，邓小平9月27日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再次提出各方面都要整顿的任务，并明确提出：“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由此可见，作为1975年整顿的核心的整党，在八九月间只是作了部署，作了准备，还没有正式展开。

此外，文章采用的一个提法——“1975年全面整顿”，也值得研究。这个提法，这些年来已经为党史界所通用，但我以为这个提法同实际情况有距离，不很确切。试简要分析1975年整顿的过程。

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后，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及时地对军队整顿作了部署，并立即雷厉风行地领导铁路整顿，重点突破这个薄弱环节后，即转而狠抓钢铁整顿，并把铁路整顿的经验推广到整个工交战线。短短三四个月，铁路面貌改观，煤炭恢复发展，钢铁改变欠产局面，工交战线出现安定团结和把生产搞上去的好势头。这是整顿的第一阶段，是重点整顿阶段。随着反对“反经验主义”斗争的胜利，邓小平7月初起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这时，毛泽东主动提出要调整文艺政策，对“周扬一案”从宽处理，邓小平即不失时机地把整顿向面上铺开并引向深入。军队的整顿，科技的整顿，国防工业的整顿，地方的整顿相继展开并取得成绩。这是整顿的第二阶段。八九月间，邓小平抓住有利时机，乘胜前进，

提出准备在1975年冬至翌年春进行“全面整顿”的任务。他在政治局讲了“各方面都要整顿”的问题，得到毛泽东赞成。又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向全党全国提出八个方面都要整顿的任务。在此前后，他还提出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为了全面整顿，邓小平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他亲自指导起草工业和科技两个条例，就是要用它们来分别指导、推动经济各部门各行业的整顿和科技、教育、文化领域的整顿。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论总纲》的社论，就是为了以三项指示为纲来指导即将开展的“全面整顿”。这时，教育的整顿正在准备，财贸的整顿尚未进行，农业的整顿也还没开始，作为整顿的核心的整党也还没有进行。所以，按整顿的实际历史进程来看，1975年已经进行的整顿还不能说是“全面整顿”，9月进入的是准备进行“全面整顿”的阶段。就在准备进行“全面整顿”而“全面整顿”还没有展开的时候，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发动起来了。这样，1975年的整顿还没有真正进到“全面整顿”的阶段，就骤然中断了。

根据以上分析，历史的真实是：“全面整顿”准备进行而没有能够展开。所以，对1975年这段历史我以为还是称之为“1975年的整顿”较为适当。

□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1期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吕青（加拿大）     | 熊波（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